

中國

教育家評傳

● 第一卷 ●



• 第一卷 • 中国
教育家评传

沈灌群 毛礼锐 主编

孙培青 韩 达 编

责任编辑 徐启宇
封面题字 方去疾
封面设计 张瑞邦
人物插图 沈 枏

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

中国教育家评传

第一卷

沈灌群 毛礼锐 主编

孙培青 韩 达 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1.125 插页 5 字数 448,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本

ISBN7-5320-0647-6/G·546 定价: (特)9.90 元

序

62143/12

● 陈元晖

最近几年来，学术界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教育科学在这种形势的鼓励下，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无论是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都有不少新著出版。中国教育史作者，这几年也表现出引人注意的积极态度。三卷本《中国教育家评传》，多卷本《中国教育通史》，书院制度史等新著叠出，可称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但教育史学家要开展研究工作，还必须注意解决下列几个问题：

一、古与今的关系问题 历史研究长期存在着古与今的关系的争论，厚古薄今，当然是错误的，但厚今薄古也不是正确的提法。在“古”中，有精华，有糟粕，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就是在“古”中有可用之处，如无可用之处，那何必去研究它呢。孔子说他自己的学习是“好古敏求”，说 he 自己是“述而不作”，他重视古，未免有些过份，但的确他从“古”中，吸取了不少精华，也去了糟粕。“敏求”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对“古”的东西不加选择的接受，那还用什么“敏求”呢？我很服膺唐朝大诗人杜甫的一句名句：“不薄今人爱古人”。大概在唐朝对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也有争论，所以杜甫才

序

在他的诗中表态。在杜甫之前好多年,《经》今古文之争,也表现出对今和对古的不同态度。托古改制,颂古讽今,这是利用“古”为其当前(今)的政治服务,从学术问题影射到政治问题。康有为提倡经今文学,著《新学伪经考》、《大同书》,也都是为他的变法的政治服务的。所以,厚今还是厚古,其中包含了政治要求。我们不薄古,是因为“古”中还有若干精华,可以为“今”用。如果在“古”中,不分其糟粕和精华,笼统加以应用,笼统厚它,势必至颂古讽今,是古非今,这就不是我们不薄古的目的,这是与我们不薄古的目的大相径庭。既然成为“史”,这就是说事实已成为过去,研究“史”,是否就必须重古或厚古呢?这就千万不能这么说。不薄古是因为“古”中有精华,可取其为今用,这与“厚古”有原则上的差别。提倡厚古的人,往往是泯灭这种差别而别具存心的人。提倡厚古的人,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吞,良莠不分,其结果是使历史为其倒退服务。不薄古,是因为“古”中有精华可撷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使历史为社会进步服务。清画家石涛说要“借古以开今”,这是指绘画而说的,但对研究历史一样适用,历史学家,教育史学家,一样要“借古开今”,借古代的经验,开展当今的教育,这是教育史学家正确对待古与今的关系的态度。采取“借古开今”的态度,才能使教育史为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服务。无论是面向现代化或面向世界,或面向未来,都必须借鉴前人的经验(古),来开发现代的事业(今)。面向世界,也有前人的经验可寻。至于重视历史,好像是面向过去,与面向未来不相容,其实,总结历史的经验(古)是为了为未来发展提供借鉴,以便比较兴替,比较得失。研究教育史,是为了教育的前进,不是为了教育的后退。发思古之幽情,只

能让像申公豹这一流的人去做。《封神榜演义》上说申公豹的头栽错了,只能向后看。研究教育史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历史不免要“回顾”,但“回顾”是为了“瞻前”,是为了前进。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这是教育史学家解决古与今关系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二、史与论的结合问题 这里所说的“史”与“论”是指教育史与教育学,它们两者的结合,应作为教育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教育史应该总结前人的教育经验,总结了的经验是经过理论思维的,经过理论思维的“经验总结”,就是教育理论,就是教育学。一部教育学不能脱离总结前人的教育经验而独立,没有教育经验就不能引起人们对教育的思维,而对教育不进行理论思维,就没有所谓教育学。教育学是教育思维发展史之学,是理论思维在教育方面发展的历史之学。严格的说,教育史应该叫做“教育学史”,是教育理论(教育学)在各部门体现的历史。教育史,有不同部门的历史,如艺术教育史、医学教育史、农业教育史等等,又有研究重点不同的教育史,如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课程史、教学法史等等,又有教育理论发展史,即教育学。名为教育史,实际是各种教育部门的历史的汇合,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理论发展史。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历来成功的实践,都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各部门、各类的成功的实践,汇合成该时代的教育学。所以,教育学史是其他各部门带头的教育史。实践是由理论指导的,指导各时代的教育实践是由各时代的教育理论负担的,所以了解各时代的主导的教育思想,就成为了解其他各种不同部门的教育史的关键。所以,教育学史的研究应成为教育史研究

序

的中心环节。既然教育学史是教育史的中心，教育史学家能对教育学漠不关心吗？教育史学家怎能忽视教育学对教育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呢？教育史学家应从教育学里吸取养分，健全自己。另一方面，教育学家同样应该从教育史中增加营养，提高理论水平。教育史是各个时代的教育经验的总结，这种总结往往是教育学的组成部分。教育学是总体，教育史是组成部分，没有组成部分也就没有总体，总体怎能脱离部分而独立。脱离组成部分的总体是虚空的，而没有总体的部分是支离的。教育学不管教育史与教育史不管教育学的分离局面必须终止。它们的结合是发展教育史研究之路，也是发展教育学研究之路，不从这一条道路向前走，就会出现歧路，就会面临深渊。清代的史学家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这话说得对，《六经》的《诗经》，是一部古代文学史；《书经》是一部古代政治史；《易经》则是一部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的万物产生的历史；《礼经》是一部古代礼制的汇编；《春秋》则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书。但是否也可以说“诸史皆经”呢？一部历史，只要它能说明一个历史规律，为什么不可以叫做《经》呢？教育学是一部理论之学，是一部教育规律之学，各个时代的教育理论，都是反映该时代的教育思潮，所以，教育学史也就是教育史，而任何一部教育史，都必须叙述该时代的教育思潮，这也就是说：教育史主要应该是教育学史。教育史与教育学是两门学科，但要互相结合。合则共荣，离则俱衰。教育史学家要学习教育学，教育学家也必须知道教育学史。教育史能不能有突破性的发展，能不能有一代名著出现，关键就在于有没有高水平的教育理论，有没有高水平的教育学素养。

三、教育史研究与启发人们积极思维问题 教育史研

究，对启发人们积极思维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历史不只是对过去的事实作一番回顾，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启发人们积极地进行理论思维，所以，历史科学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不仅要回忆过去的，而且要策励人们向未来前进的。鉴古可以知今，借古是用以开今，知今和开今，都必须有积极的思维。积极思维才能使古为今所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曾谈到后人为什么要学习古希腊哲学，说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所以，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回到古人那里去，是因为他们可以启发我们积极思维。以古人为镜子，以胚胎、萌芽形式作借鉴，从原理、原则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接受经验教训，可以启发思维。回顾旧历史是为了写新历史。追溯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为了寻找发展的线索，寻找规律。研究教育史的目的，也就是为观察教育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胚胎和萌芽的形式。教育史是历史科学，但研究家应该把它看作是思维科学，这样才能使教育史成为启发思维的学科。

四、教育史研究与东西文化交流问题 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应与外国教育史研究结合起来，东西结合，知己知彼，才能对教育发展的历史有比较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各个时代均可以找出外国教育思想影响的痕迹。佛教思想的影响，在汉朝以后的教育史中可以看到。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辩证唯物主义成为进步的教育思想的指导思想。本世纪20年代前后，一直到30年代时期，中国在广

大地区流传着洛克、斯宾塞、杜威等经验主义者的教育著作，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成为国民党地区主导的教育思想，这些事实都必须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清朝张之洞提出来的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政策，影响一代的教育方针和课程安排，这是以封建思想来抵制外来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教育口号，对中国教育起了一度影响。文化有东西，但真理无东西，是真理，就无分东西。不能以地域为界限来区分真理和假伪。在近代，西方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很深，中国的大门被大炮轰开后，在教育方面不仅在制度上及其他形式方面，搬用西方的一套，而且在课程、教法及其他教育内容方面，也是采取西方的东西。本来应该是中西文化的交流，结果变成中学与西学的对立。西学要压倒中学，中学也力图抵制。为了要抵制西学，就不是只取其中学中的精华，而是兼及糟粕，如尊孔读经的提倡，中国近代教育史反映了这种情况。有人认为现在也可以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旧瓶不是也可以装新酒么！我认为万万不能再重提这一口号，这一口号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提出来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它是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万不可以应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我们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吸取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实现现代化的工作。教育史研究一方面要注意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一方面要摒弃陈旧的口号，这是应该注意的事。

上面所谈的四个问题，供中国教育史研究家参考，也作为自己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努力方向，并作为献给《中国教育家评传》的作者的刍蕘。

出版说明

为了发扬祖国优秀文化，研究和继承我国教育的宝贵遗产，我们组织出版了《中国教育家评传》，共分三卷，古代部分两卷，近现代部分一卷。

《中国教育家评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充分占有史料并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选写的50位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概括而言，这是一部以评为主、评传结合为特点的学术著作。

为了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本书编委会邀请国内教育史界对入选教育家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要求揭示每个教育家及其代表的学派教育思想，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探索其经验与教训。对于历史分期，各教育家的政治观、哲学观、教育观等问题的研究与阐述，编委会尊重撰著者的见解。

《中国教育家评传》，由沈灌群、毛礼锐任主编，编委会由毛礼锐、孙培青、沈灌群、李国钧、陈本铭、金立人、韩达、廖增瑞组成，日常工作由李国钧、韩达负责，并实行分卷责任编辑制。

本书编写中参考和汲取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除

在书中注明外,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理论水平及历史知识所限,且限于其他条件,书中缺点及不足之处,敬希国内外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7年12月

卷 目

姬 旦	梅汝莉 (1)
孔 丘	梅汝莉 (39)
墨 翟	谭佛佑 (125)
孟 轲	杨荣春 (191)
荀 况	高时良 (229)
董仲舒	张鸣岐 (267)
王 充	赵一民 (317)
郑 玄	俞启定 (373)
颜之推	孙培青 (419)
王 通	罗佐才 (459)
孔颖达	杨荣春 (525)
韩 愈	孙培青 (557)
柳宗元	张如珍 (613)

姪

旦

梅
汝
莉
撰



目 录

一、生平政绩·····	(6)
二、教职与教育思想·····	(8)
三、教育活动与贡献·····	(15)
(一) 师保之教 ·····	(16)
(二) 社会教化 ·····	(22)
(三) 对“六经”和“六艺”的 贡献 ·····	(27)

周公



姬旦，在历史上称为周公，是我国三千年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比较看重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建树，而对他在教育上的贡献，却未予重视。事实上，在周公的一生中，教育活动卓有成效，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对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周公应有他一定的地位。

评述周公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动，必然涉及到文献依据。考古的成就，使西周年代学有了新的进展，也使大批典籍恢复了使用价值。自汉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周礼》、《仪礼》不是周公所著，而是刘歆的伪作。但是，中原地区战国墓葬的有关研究，揭示了这些墓地安葬时所体现的礼制，与《周礼·冢人》、《周礼·墓大夫》、《周礼·大司徒》等篇的内容，基本上可以互相印证^①，说明《周礼》并非后人编造，它有着战国以远的古老渊源，与礼制的集大成者周公也不无关系。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本文所依据的典籍除《周礼》、《仪

^① 叶小燕：《中原地区战国墓初探》，《考古》1985年第2期。